

中国
伊斯兰
教史

王灵桂 著

中國

伊爾

歷史

·

中国
伊斯兰
教史

王灵桂
著


中国
友谊
出版
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伊斯兰教史 / 王灵桂著.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0.7

ISBN 978-7-5057-2759-5

I . ①中… II . ①王… III . ①伊斯兰教史—中国
IV . ① B9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3252 号

书名 中国伊斯兰教史
作者 王灵桂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10×1000 毫米 16 开
23.75 印张 33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759-5
定价 48.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汲来江水烹新茗

(代序)

王灵桂先生新近付梓的专著——《中国伊斯兰教史》，是他长期从事伊斯兰教研究，潜心钻研中东与阿拉伯问题的过程中，梳理常年的学术成果、提取思维精华、充实修改观点、推敲润色文字、完善章回布局后所成就的又一力作。全书约38万字的篇幅，勾勒出了中国伊斯兰教形成发展的完整概貌，堪称经纬古今、浓墨重笔，值得一读。

该书对伊斯兰教的产生、兴起和演变，以及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生根发芽的历史进行了深入分析和阐述。通读全书，仿佛触摸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根脉，在每一处充满哲理与感动的地点，用心思索、细心感悟，每每从中感受到一种悠久凝重的古韵，体会到一种深奥的哲学灵感。

丰厚历史沉淀力透纸背的冲击，令我产生了对各种文明、文化及思想、教义的壮阔深沉的想象。文化的力量伟大而雄浑。当今时代，一切竞争归根到底都是文化竞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交融日益频繁；交锋、碰撞愈益激烈，某种文化认知，很可能产生重大的政治、经济、地缘战略影响。其中含有“文化”与“被文化”的安全考量。由此深感“软实力”其实不软，“文化”与“武化”共同构成国家综合实力之两轮。

从“软实力”意义上讲，一个国家，其影响之大小，与其形象密不可分。构成“国家形象”的诸因素中，除政治、经济、军事、发展模式之外，文化因素至关重要。一个社会，其稳定度如何，与社会和谐密切相关。构成和谐社会的原因，既取决于收入差距、就业水平、执法公正、宜居程度等经济社会条件，也与文化因素的“和而不同”密切相关，即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理解、凝心聚力。

2 中国伊斯兰教史

宗教的活力之强弱，在于其能否理性地处理好宗教内部、宗教之间、政教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宗教内部的不同派别之间，需要心灵、情感、文化上的理解。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间，尤需增进相互之间的交流。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共识，进而形成并加强文化认同。这对促进社会和谐与民族团结尤为重要。

扬古代贤人哲理思维之要，观当今宗教、文化、社会领域之现状，一方、一国、一域的长治久安，其根本之策在于含和、履中，即一方气候中和、国家气候中和、世界气候中和。由此，才能实现一方无灾、国家安乐、世界太平。换言之，宗教内部的和谐、宗教之间的和谐、宗教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宗教与政权关系的和谐，尤为重要。若上述几对关系不能保持中正和谐，就不会有和谐的人际关系、教派关系、民族关系、政教关系乃至国际关系。

亚洲文化与宗教传统丰富多样。在世界史上，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亚洲文明。当今世界，文化激荡，在全球文明大格局中，我们不仅要看到亚洲经济的繁荣，更要看到亚洲文化精神的日益上升。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融合、发展，是亚洲文化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文化丛林中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是人类文化奇葩。它足以论证，中国今日的和平发展并非孤立、偶然，亚洲崛起亦非纯经济因素使然。其中，文明对话而非对抗，文明交融而非交恶，文明沟通而非冲突，海纳百川的东方文明构成了亚洲大趋势的文明背景。

从科技进步角度讲，宗教和科学不同，它要求信仰者完全信任教义，不能有任何怀疑。另一方面，宗教不应排斥科学，而应注重科技与信仰的共生。历史上，伊斯兰教对世界科技发展、国际科技交流的贡献是巨大的，对中国科技也起过巨大的推进作用。

从政治文化角度讲，中东、南亚、中亚等地区，宗教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宗教背景或由宗教因素触发的社会矛盾和群体纷争层出不穷。作为控制和黏合的凝聚机制，伊斯兰教对神神关系、人神关系、人人关系甚至国际关系的确定，影响着世界十几亿人口。因之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区域安全乃至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

从人性修养角度讲，其教义阐述的人性观、得失观、价值观、世界观，为穆斯林社会成员个体伦理认知、判断行为得失、做出道德选择提供了价值标准，起着精

神修养和陶冶及价值规范性作用。如伊斯兰教的天堂地狱之说,熏陶、影响、演变、塑造了教徒,内在形成了善良、纯朴、睿智、和谐的心灵意识与操守;并外向地表现于语言、建筑、医药、饮食、服饰、风俗。

我国元代杰出的大诗人萨都刺身为回回,他的诗常常反映出穆斯林的世界观,如七律《安分》诗:“心求安乐少思钱,无辱无荣本自然。——万事皆由天理顺,何愁衣禄不周全。”诗中表达的宠辱不惊、随遇而安、旷达自怡、知足者常乐、凡事顺乎天理、勿怨天尤人的思想感情,正与一般穆斯林“信前定”的操守相吻合。^[1]

“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儒教文明开放包容和谐的本质,促使中国接受了许多来自异域的新知识、新文化。伊斯兰教步入华夏大地发展已逾千年。我国最早的木刻《古兰经》问世于清同治元年,汉译全文《古兰经》的出现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儒伊两大独立文明虽有差异,虽有矛盾,但还是成功地进行了交流、沟通,乃至相互理解、尊重,以及在价值观、荣辱观、人性观等方面的部分相互认同。正所谓,学而即教,教而即学,两者互资,互相尊重。

抚今追昔,在中国西域这一伊斯兰教发展的源头,那么多的古国与古民族消失了。但伊斯兰文化则像葡萄、胡杨、红柳一样,扎根于土壤,汲取“岩韵”,普受阳光,与土著文化融合,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鲜活地融入现实生活,至今,已不是异质的外来文化,而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成语曰“万众一心”。“万众”即指56个民族的13亿人民。我国五十多个民族中,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东乡、塔吉克、乌兹别克、回族等民族。同样信仰伊斯兰教,但各民族的“出身”截然不同:天山南北的维、哈、柯等民族是先有民族而后皈依伊教;而回族则是由信仰伊教而逐渐形成。“一心”即指政治认同、国家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以及正确的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要做到“一心”——增强中华民族内部凝聚力,离不开对伊斯兰文化的理解及尊重;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和谐稳定,离不开对伊斯兰教的深入研究。

中国在国内充分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并通过宪法与法律加以保障。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保持和促进宗教和谐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不容忽视的是,受现阶段“段情”的影响,宗教关系越来越复杂,涉及宗教因素的

[1] 林松、和龚著:《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P367

4 中国伊斯兰教史

矛盾愈益增多，有些与经济、民族、社会问题相交织，容易演变为敏感问题或突发情况。

在国际上，伊斯兰世界幅员广阔，地大物博：由 55 个国家组成（22 个属阿拉伯国家），人口 10 亿多，占地 3200 万平方公里，主要集中在中东、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包括美欧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也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2001 年的“9·11”把伊斯兰世界推到国际政治前沿，成为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重要因素。

人们对伊斯兰世界这一战略力量有清楚的概念吗？我看认识远远不够。一方面，历史上，由于欧洲殖民主义对伊斯兰国家进行的文化侵略的烙印，以及一些西方传媒有关“文明冲突论”与“伊斯兰威胁”论的误导，当今世上，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带有不少的误解、曲解、未解。另一方面，在中亚、南亚、高加索及中国新疆活动猖獗的极端宗教组织“伊扎布特”，妄称建立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在巴基斯坦部落区与巴军交战的，除“巴塔”外，还有来自阿富汗、车臣、达吉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地的宗教极端分子。这些因素加剧了人们的担心，如果反恐路线走偏，区域安全危险将急剧上升。

始于 2009 年新年的奥巴马“新政”，改变了其前任布什政府与伊斯兰意识形态及伊斯兰世界为敌的政策，这与其经济、贸易、金融、地缘、核安全等政策互为一体，构成了重振超级大国地位的大战略；但从文化、文明等更大背景上看，应该是美国上层“文明观”、“宗教观”的修正，以及对伊斯兰世界战略方阵作用与能量的新认识。

巧者善度，智者善预。如何化解宗教冲突，倡导文明对话，使之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服务于和谐世界建设，乃各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中国是伊斯兰世界的朋友，致力于促进宗教和睦、文化交流，以实现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读罢本书，深感作者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古人云：好书不厌看还读；益友何妨去复来。信笔写此点滴，且作为小序，与读者共勉，向作者致意。

陆忠伟

2010 年端午京郊廊桥东里

导 论

宗教是人类实践抽象的必然结果。它仿佛远离世俗、神玄莫测，但只要撇开各种先天偏见，拿开种种有色眼镜，放弃唯我独尊的心态，就能把握住其本来的真正面目，了解到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宗教虽有相对的特异性和独立性，但仍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并对其产生重要作用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1]。伊斯兰教^[2]也不例外，它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有其固有的原因，并伴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有着其自身发展变化的必然过程，并体现出了丰富多彩的多元化特点，既有值得称道之处，也有被人诟病之点。本书试图把这种“超人间的力量”还原为“人们日常生活”，从伊斯兰教的最初起源及其发展，看其进入中国的生根发芽和演化，给读者一个中国伊斯兰教的完整概貌。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嬗变和发展，是研究整个伊斯兰教发展和中华民族发展均难以回避的问题。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从不同角度和范畴进行了研究。但是，目前对该问题的研究仍旧十分薄弱。从目前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分布在伊斯兰教及其历史的研究，以及中国回族研究两大领域。由于研究对象和主体的限制，对伊斯兰教本身及其在中国的传播缺乏系统、

[1]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第35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 伊斯兰教是“伊斯兰宗教”的简称。伊斯兰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意思是“顺从”，指顺从真主安拉的意志即可获得平安乐。作为宗教，它的信仰者，应坚信真主安拉为独一的、至上的主宰，并应顺从安拉的旨意。这些人通称为穆斯林（由伊斯兰一词转化而来，为阿拉伯语的音译，意思是顺从者）。

2 中国伊斯兰教史

完整的阐述：在伊斯兰教及其本身的研究中，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仅仅是作为其在世界各地流传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揭示不够；而在对中国回族研究的著述中，对伊斯兰教及其发展的过程和其丰富多彩的一面挖掘得不深。更值得指出的是，伊斯兰教作为中国十个少数民族信仰的宗教，仅仅研究回族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笔者认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必须要注意到其作为外来宗教在中国融合和发展这个背景；研究世界伊斯兰教，必须要注意充分注意到中国伊斯兰教的鲜明特点和个性。因此，作者力图站在国内外学者对两大领域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一次跨领域的探索性研究实践和尝试。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六次会议上指出：“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3]。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虽然是在70多年前讲的，但今天重温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和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是21世纪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如何处理好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国内社会政治稳定问题，也因为伊斯兰教的国际性而成为一个重要的对外工作问题。因此，研究伊斯兰教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对指导我们维护国内社会政治稳定，维护和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和战略意义。

在西方学术界，散布攻击伊斯兰文明的言论历来不胜枚举，加深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敌意的所谓学术成果从未断绝。其中，尤以理查德·尼克松的《只争朝夕》(SEIZE THE MOMENT)、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和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为代表。这些以倡导西方文化、政治、经济对世界霸权的西方学术界精英，在极力推崇自身文化优越性和排他性的同时，公然声称共产主义和伊斯兰教是西方文明的真正敌人。冷战结束后，长期被

[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2—53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两极格局掩盖的民族宗教问题爆发出来,成为地区动荡和地区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萨缪尔·亨廷顿在断章取义,歪曲历史基础上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从一定意义上说,则又进一步加深了西方社会对民族宗教问题的偏见,使其对民族宗教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宗教的认识进一步贴上了“恐怖化”、“极端化”的标签,对发展中国家少数民族的认识则贴上了“分裂化”、“异端化”的标签。尤其是“911事件”后,作为发展中国家重要宗教的伊斯兰教,被“妖魔化”、“暴力化”的歪曲趋势更加突出。“美国与其他西方世界的媒体一直强烈关注穆斯林与伊斯兰教,而且大多带有高度夸张的刻板印象与来势汹汹的敌意……”,“事实上,伊斯兰教在劫机与恐怖事件中的角色,伊朗之类的穆斯林国家对‘我们’与我们生活方式的威胁,以及对于炸毁建筑、破坏民航机、毒害水源等阴谋的揣测,都在西方人的意识中水涨船高……”,“这些理念近来声势惊人;然而在今日,对于所有其他文化团体的种族或宗教形象扭曲,都不能像扭曲伊斯兰教形象这样肆无忌惮地进行。对伊斯兰教心怀恶意的概括化,是西方世界中唯一能被接受的污蔑外国文化行动”^[4]。总之,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某些媒体和学术界在刻意扭曲世人对伊斯兰世界的观感,散布伊斯兰教“在精神上更接近于其它类似的运动(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而非传统宗教”,“正在威胁全世界,威胁‘我们’”^[5]。不可否认的是,在西方舆论的长期影响下,某些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认识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形、走样。因此,客观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描绘一个真实的伊斯兰教画像,将有助于消除西方媒体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形象扭曲”,有助于我们巩固和发展同伊斯兰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有助于团结国内10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投身于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时代工程。

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伊斯兰文化,是兼收并蓄了阿拉伯、波斯、印度、希腊等东西文明融合而成的一种新文化,是中世纪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并在发展过程中成长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大文化。我国著名的阿拉伯历史学家纳忠教授曾经对该文化进行过精辟的概括和总结。他指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乃由三种文化汇合而成:

[4] 爱德华·萨依德(美)著,阎纪宇译:《遮蔽的伊斯兰:西方媒体眼中的穆斯林世界》,第50-51页,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6月第1版。

[5] 爱德华·萨依德(美)著,阎纪宇译:《遮蔽的伊斯兰:西方媒体眼中的穆斯林世界》,第60页,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6月第1版。

4 中国伊斯兰教史

一是阿拉伯人固有的文化；一是伊斯兰教文化；一是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等外族的文化”^[6]。当伊斯兰教离开阿拉伯本土向四方传播，又与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相适应，从而形成具有各地区、各民族特点的伊斯兰文化。向西方传播后，便照亮了欧洲黑暗的天空，对西方科学文化事业的复苏和繁荣起了先导和促进的作用，欧洲人从伊斯兰文化中重新接触和认识了古希腊文化，从而重建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在2009年11月6日至8日举行的第六届北京论坛上，曾专门强调：“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如果没有人把阿拉伯文化的精髓介绍到西方，文艺复兴怎么能兴起？更不用说启蒙运动和现今的西方社会了。总的来说，中世纪的西方社会大大得益于伊斯兰文明”^[7]。

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后，也为古老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当时富有先进时代意义的伊斯兰文明。应该说，在我国历史上，是伊斯兰教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把西方文化介绍到了中国。同时，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将从中国学会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重大发明传入了欧洲，丰富了欧洲人民的生活，加速了欧洲经济文化的发展，火药“经阿拉伯人传入西方后，却被改造成征服世界的武器”^[8]，“他们是值得永远

[6] 艾哈迈德·爱敏〔埃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1册，纳忠译，译者序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页。

[7] 《中华读书报》，2009年11月18日，第17版文章《对21世纪人类困境的回应——伊斯兰、儒家和基督教文明的对话》。

[8] 徐秉君：《别再吃“四大发明”的老本了》，刊于《环球时报》2009年2月16日，第11版。该文指出：“四大发明”并不能代表真正意义的中国。首先，中国古代具有时代意义的创造发明远不止于“四大发明”。世界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曾经列举了中国传入西方的26项技术，认为中国最重要的发明远不止于这“四大”。最近有中国学者提出，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发明有24项，在这24项发明中，稻作、丝、十进制值制、漆、瓷、纸、印刷术、茶、火药、火箭、指南针等，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巨大。该文还指出，“四大发明”的提法也是舶来的。有关资料表明，最早认可中国发明的人是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他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后来，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最先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说：“我们必须牢记，他们（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由此可见，中国“四大发明”的提法最初也是源自西方，那是一些学者就这几项发明对人类文明，特别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所做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尽管中国的“四大发明”得到世界的公认，但真正发挥“四大发明”效能的却不是中国。比如，指南针虽给郑和的七下西洋带来了方便，但对自身的发展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而当这一发明传到西方后，给西方带来的却是“蓝色文明”；火药的发明给中国带来的只不过是连续数千年的喜庆，至今中国的烟花爆竹仍然是举世无双。可是，这项发明经阿拉伯人传入西方后，却被改造成征服世界的武器，而最大的受害者恰恰是火药的发明者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使其发挥最大效能的并不是中国而是西方。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可自豪和骄傲的？纵观被中国学者认可的中国古代的24项重大发明，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深思。在这24项发明中，有4项始自史前，3项始自夏至春秋，7项始自战国秦汉时期，其它10项分属中古和近古，其中唐代2项，宋代6项，元明各1项，至清代后便再也未出现任何创造性发明。我们当然可

纪念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9]。所以,如果说当时伊斯兰教作为在阿拉伯半岛刚刚创立的新兴宗教,在创立伊始,就通过先知穆罕默德与中国有了一种理论和哲学意义上的联系,那么伊斯兰教在进入中国后,经过 1350 多年^[10]的曲折本地化发展,吸收了中华文明的营养,已在中国的 10 个少数民族^[11],共计 2000 多万人口^[12]中生根发芽,并形成了作为中华民族文明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独具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地化发展,从一个侧面也印证了中华民族独具的包容力和凝聚力。许嘉璐先生曾在其《深研元典振兴道家》中专门强调:“中国三大宗教的相融共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包容大度的表现。正是因为三教自古相融共存,更增加了中华民族对异质文化包括外来宗教的包容能力,所以此后陆续进入中国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也都能在不同程度上中国化,在中国生根、开花”^[13]。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传统研究基金会主席赛义德·侯赛因·纳赛尔(SEYYED HOSSEIN NASR)在 2009 年 11 月 6 日至 8 日举行的第六界北京论坛上,专门就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对话阐述了很精彩的论断。他说:“伊斯兰和儒家文明一同影响了这个世界近一半的人口,伊斯兰和儒家文明的对话不仅要探讨伊斯兰世界和儒家世界之间的关系,还要探讨伊斯兰和儒家文明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基于多种原因,有必要完整记述伊斯兰同中国从科技到天文再到哲学等很多层面的历史交流,其中一个不容小觑的原因是双方的交流是世界文明史上最精彩的一页。而且,双方交往的长久历史对今天两种文明间建立

以为自己的祖先骄傲,但我们却没有理由为自己骄傲,因为我们还没有创造值得骄傲的资本。

[9] 郭应德:《阿拉伯史纲》,第 3 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年 3 月,第 2 版。

[10] 伊斯兰教正式传入中国的始初年代,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据清光绪甲申江苏书局开雕本《唐会要》卷 100 所记:“永徽二年八月,大食遣使朝贡”。大食,又称为“条支”。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始称阿拉伯为“条支”。此为波斯文 Tajik 或 Tazi 之变音,为波斯人对阿拉伯人之称谓。《唐会要》所记,是我国可查到的最早史料,此说说明至少在公元 651 年,即伊斯兰教历 31 年,已有伊斯兰教徒正式进入中国。

[11] 我国的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保安族、塔塔尔族等 10 个少数民族,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伊斯兰教在这些民族中有着重要影响。此外,伊斯兰教在我国的蒙古族、藏族、白族、傣族等少数民族中,也有少量信仰者。

[12] 我国 10 个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总人口为 20320580 人。其它民族中也有少量信仰伊斯兰教的,没有统计在本数字内。本数字是据《历次人口普查全国分民族人口—2000 年》数字汇总的,载于《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4 年版,第 487 页,民族出版社,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13] 《新华文摘》,2009 年第 11 期,第 110 页。

6 中国伊斯兰教史

和谐发挥了基础性作用，而建立和谐的基础不仅是现实考虑”^[14]。

这个文化的核心，就是遵循伊斯兰经典中的“爱国属于伊玛尼^[15]”、“从国是天命”等教规，提出了“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争教必先争国，国存教才存”等主张^[16]。广大穆斯林群众把爱国和爱教有机统一起来，将热爱中华的优良品德融入进了民族心理、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反映出了历史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体现了深深眷恋祖国母亲的拳拳赤子之心。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传统研究基金会主席赛义德·侯赛因·纳赛尔（SEYYED HOSSEIN NASR）曾敏锐地指出：“中国和伊斯兰社会都是有着极大相似性的。如对道德观的尊崇，相信世界万物有自然规律，人的行为也有宇宙的力量，还有对家庭负责，以及遵守法律。另外，中国和穆斯林民族一样，是一个崇尚中庸的民族。他们行事温和，避免极端”^[17]。

中国共产党历来实行大小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高度重视伊斯兰教问题，关心广大穆斯林的福祉。党的“八七会议”后，党在一些穆斯林聚居区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长征途中，又帮助宁夏的穆斯林群众建立了宁夏豫海回民自治政府，这是我国最早的县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在延安时期及以后的时间里，我党为建立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夺取全国政权，为新中国的发展和建设，更是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伊斯兰教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主张，颁布了许多深得民心的政策，制定了一些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如，1940年年初，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的李维汉同志，专门在延安《解放》杂志上发表了《长期被压迫和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回回问题研究》等文章。随后，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印发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这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关于对伊斯兰教问题^[18]的专门纲领性文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各族穆斯林群众为抗

[14]《中华读书报》，2009年11月18日，第17版文章《对21世纪人类困境的回应——伊斯兰、儒家和基督教文明的对话》。

[15]伊玛尼，意思是信仰，是阿拉伯语的音译。伊斯兰教中的伊玛尼，是指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经典和信条的承认和确信。我国内某些地区的穆斯林以伸出食指表示伊玛尼，即信仰唯一的真主。

[16]《回族爱国主义传统教育读本》，第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17]《中华读书报》，2009年11月18日，第17版文章《对21世纪人类困境的回应——伊斯兰、儒家和基督教文明的对话》。

[18]在我国历史上，伊斯兰教曾被称为回回教、回教，又称大食法、西域教门、回回教门、清真教、清真古教、天方教、穆罕默德教、教门、正教（明末清初王岱舆《正教真诠》中说，伊斯兰教“推其理真久不偏”，故称为正教）等。信仰伊斯兰教的被称为回民、回回。1956年，周恩来总理曾在审定关于伊斯兰教问题的文件时指出，

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911事件”后国际舆论和国际学术圈的炒作，我们在如何与时俱进地处理好伊斯兰教问题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挑战 and 困难。因此，从历史的角度，以发展的眼光，审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更好地弘扬和激发中国穆斯林爱国爱教高度统一的优良传统，对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当前，经济全球化挟裹着消费主义、贪欲膨胀等违背人生、社会和自然规律的意识形态滚滚而来，侵蚀着人们的灵魂，腐蚀着人们本应亲切和谐的关系，扭曲了人本来纯朴善良的性格。照此下去，社会将不得安宁，世界将不得安宁。无论是伊拉克战争，还是近来惊骇全球的金融危机，究其实质，无不是‘悖’道而行之的结果。在混乱不安的当今世界，唯有中国‘风景这边独好’，呈现出一片祥和、和谐、安定的氛围，即使我们遇到了自然的灾害和人为的干扰，我们也都能沉着应对，使挑衅失败，变难关为不难。这是偶然的吗？不！这是因为我们的制度优越、我们的领导力量坚强、我们的人民可爱；而贯穿于制度、领导和人民心理意识中的，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在飘忽不定、动荡不安的世界风云中，中国要立于不败之地，要对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我们独特的贡献，就必须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就需要充分发挥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对话的作用”。^[19]

作 者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于西山颐园寓所

中国除了回族以外，还有9个少数民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因此称伊斯兰教和其信仰者为回教、回民等是不准确的，应将回教改称为伊斯兰教，将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统一称为穆斯林。1956年2月，国务院专门就此下发通知，指出：“伊斯兰教是一种国际性宗教，伊斯兰教也是国际通用名称”，“今后对伊斯兰教一律不用回教这个名称，应该称伊斯兰教”。从此，在中国大陆都用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这些更规范的名称。但在香港、澳门、台湾，以及东南亚华侨华人中，至今仍沿用回教或回回这些称谓。

[19] 许家璐：《深研元典振兴道家》。刊于《新华文摘》，2009年第11期，第109页。

代 序 /1

导 论 /1

第一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和发展 /1

- 一、中世纪初阿拉伯半岛基本矛盾的精神产物 /3
- 二、穆罕默德与伊斯兰政治运动的兴起 /10
- 三、伊斯兰教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形成 /17

第二章 伊斯兰文化体系的形成及其基本情况 /25

- 一、伊斯兰文化体系的形成及贡献 /27
- 二、伊斯兰教经典的形成 /34
- 三、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 /40
- 四、伊斯兰教的宗教制度 /45

第三章 伊斯兰教的教派 /49

- 一、伊斯兰教教派产生的背景与根源 /51
- 二、逊尼派及其教法派别 /53
- 三、什叶派的形成、基本主张及其主要分支 /57
- 四、哈瓦利吉派的形成及其主张 /63
- 五、穆阿台及勒派的形成及其主张 /65
- 六、苏菲派的形成及其分支 /67

第四章 当代国际伊斯兰复兴运动 /75

- 一、伊斯兰复兴运动概述 /79
- 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三种主要表现形式 /83

三、当代伊斯兰复兴与国际热点 /90

第五章 丝绸之路、大唐遣使与住唐商贾 /101

- 一、伊斯兰教创立之前的中阿交往 /103
- 二、关于伊斯兰教何时进入中国的问题 /106
- 三、住唐商贾与蕃坊 /112
- 四、中国社会对伊斯兰教的初步了解 /115

第六章 伊斯兰教在中国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 /119

- 一、五代时期伊斯兰教在边疆地区的发展 /121
- 二、宋代穆斯林数量的急剧增加 /123
- 三、元代回回遍天下 /126
- 四、明朝时期的伊斯兰教 /135
- 五、清朝时期的伊斯兰教 /144
- 六、民国时期的伊斯兰教 /156

第七章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国内伊斯兰教的政策 /163

- 一、唐朝时期“宽容接纳”的伊斯兰教政策 /166
- 二、五代时期各割据政权的伊斯兰教政策 /169
- 三、宋朝时期的伊斯兰教政策 /171
- 四、元朝时期的伊斯兰教政策 /174
- 五、明朝时期的伊斯兰教政策 /179
- 六、清朝时期的伊斯兰教政策 /184
- 七、民国时期的伊斯兰教政策 /192

第八章 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199

- 一、伊斯兰教适应中国环境的必然性 /202
- 二、凯拉姆体系的形成 /206
- 三、《古兰经》的汉译活动 /217